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抽象且不容易精确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和用处有许多。有的是针对个人的，比如说“某人的文化水平如何如何”。有的是针对一个领域的，比如“茶文化”。有的是针对一个集体的，比如“某某企业文化”，等等。这里所指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我们不妨从‘文’和‘化’的起源来看。文和化都是很古老的汉字。在甲骨文和稍后的金文中，‘文’分别是这样写的：

‘文’的原意是通过交错刻画线条，即文字和符号等，来表达内心的意识和想法（心，意识）。

‘化’在甲骨文中是由一个站立的活人和一个入土的死人组成的。所以‘化’的原意是代表自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综合起来看，文化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它是通过文字、符号或其它形式来表达人们的意识、情感、思想和精神。其二，文化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和积累而形成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相、用”

为了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这里借用了佛家“体、相、用”的观念。在佛法中，一切事物一般都可以从‘体’、‘相’、‘用’三个角度来分析。所谓‘体’是指事物的本体，即性质；‘相’是指事物的表象；‘用’是指事物的功用。比如拿一块冰雕来讲。它的体是水（ H_2O ），相是冰，用是供人们欣赏和娱乐。除此之外，水的相还可以是气态的水汽和液态的水。水的用有很多，例如能让人解渴的饮水，推动机器运转的水蒸气，和消暑降温用的冰块等。通过“体、相、用”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事物。

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儒家思想的总纲是什么呢？其实在《论语》中，孔子已经给出了答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让我们用“体、相、用”的方法来分析一下儒家思想的总纲。儒家思想的体是‘道’，也就是孔子对曾子所讲的“吾道一以贯之”里的‘道’。它的相是‘德’和‘仁’。‘德’是修道人自身修养和品格的体现（自受用），而‘仁’是体现在于人交往过程中的（他受用）。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追求‘道’的人，他的言行举止中一定会体现出‘仁’和‘德’。儒家思想的‘用’则是‘艺’。狭义的‘艺’包括‘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广义的‘艺’则涵盖了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各个方面。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相、用呢？我们知道文化是属于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是中华民族在千万年的演化和传承中，汇集而成的，具有其特色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的总和。具体来讲，它包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三观），和以儒家、道家、佛家、墨家为代表的各种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是对其‘体’的直接表达和详细论述。它包括所有承载中华传统思想的典籍。例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道德经》、《庄子》和《列子》等，佛家的三藏十二部，以及其它各家各派的经典和论著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用’更是包罗万象。它包括传统文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传统戏曲、民族工艺、中医武术、对联灯谜、烹饪服饰、建筑装潢、风俗习惯等。之所以把这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用’，是因为它们的功用并非是为了直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求而产生的。比如中华武术虽然包含了阴阳太极、五行八卦、动静兼备、刚柔并济等多种中国传统思想元素，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和功用是为了强身健体和自我防卫。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它的体、相、用的总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举世公认的。其博大主要体现在它的‘用’上，其精深主要体现在它的‘体’上。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是两者之间的桥梁：‘相’是‘体’的具体表现，‘相’又是‘用’的理论依据。

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上有很多正反两面的事例可以说明这点，下面仅举三例。其一，虽然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外族的侵略和统治（如五胡乱华，元朝等），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却从未中断过。因此中华文明是举世公认的最古老，且未曾中断的文明，也是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二，以色列能够在灭亡近两千年后而复国，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奇迹。其主要原因是犹太民族在亡国以后，他们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一直都还保留着，没有被丢弃。所以，以色列才会复国。其三，曾经由成吉思汗建立的幅员辽阔、盛极一时的蒙古帝国，在短短不到六十年里就分崩离析。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领土上没有一个是统一的、深厚的、可以维系国家统一的传统文化。通过以上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其团结和发展的必要因素。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很清楚这个道理。有些国家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甚至反用这个道理。今年奥巴马总统历史性地访问了古巴。这次访问代表了古美两国的破冰之旅。但我认为真正敲开古巴大门的是随之而来的英国滚石乐队在哈瓦那举行的露天免费演出和香奈儿时装秀。其实英国和美国都知道，文化侵略是征服一个国家最有效的方法。当年日本在台湾和在东北建立满州国也是这样打算的。

人不能没有灵魂。人若失去了灵魂，就成了一具任人宰割的僵尸。国不能没有其特有的传统文化。国若失去了传统文化，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地”。我们的祖先们很早就意识到这点了。孔子为什么要整理和汇编“六经”？为什么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什么要极力推崇尧、舜、禹三代？为什么要大力宣扬周公之礼？为什么要经常赞叹古圣先贤？就是为了使从上古流传下来的华夏文明得以保存和发扬光大？大家都知道《孟子》中有句名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们一般认为，这里的‘后’只是代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样的解释是片面的、

肤浅的、经不起推敲的。难道人还不如猫、狗、老鼠（越是低等的生物，繁殖能力越强）吗？难道那些由于生理上的原因而无法生育的夫妇就是大不孝吗？难道生养忤逆不孝的子孙比“无后”更好吗？其实传宗接代最主要的目的是使祖先留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能够得以传承。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才是真正的大不孝！

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文革动乱等一系列变动后，传统文化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生死存亡的地步。取而代之的是流行于西方的三种思潮：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利益、快乐和自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有其独到的观点。这里让我们看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利益、快乐和自由的理念。从而了解其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

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就其本义来讲，功利主义是中性的。关键是如何定义‘利’。显而易见的是，现在奉行功利主义的人们，大多是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准则的。当然，人有私欲是很正常的事，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利益。但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得失，这样的功利主义是很有害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利”的理念大致有以下三点。

其一，轻‘利’而重‘义’。在《论语》中，我们知道孔子平时很少谈利益（子罕言利），却十分强调道义。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为什么要轻‘利’而重‘义’呢？当今世界，人与人，教与教，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这是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利’字。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稍做调查，就不难发现一个规律。

现在，凡存在高额利润的行业背后，多会隐藏着许多血和泪的故事。莱昂纳多主演的《血钻》（Blood Diamond）真实反映了钻石行业背后的血腥故事。前些时，我读到一篇关于在东南亚一带“鱼奴”们在海上被强迫捕鱼的悲惨故事。许多高科技电子产品背后也多有非人道的奴役和剥削。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意识到‘利益’是产生矛盾和剥削的内因，而‘道义’却是避免矛盾的良方。所以在《易传·乾文言》中就有：“利者，义之和也”。意思是要得到利益，就要讲求与道义的统一，要合情、合理、合法地取得利益。否之，就会“放于利而行，多怨”。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很能说明中国人‘重仁义、轻利益’的传统。梁惠王问孟子：“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能让我国得到利益的良策吗？”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讲利益呢？有仁义就足够了！大王说‘何以利吾国’？大夫说‘何以利吾家’？老百姓说‘何以利吾身’？这样上下索求利益，那么国家就很危险啦！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如果人们后义而先利，那就会变得贪得无厌，唯利是图了。仁者不会遗弃他的亲人，义士不会怠慢他的君主。大王只要谈仁义就足够了，何必谈利益呢？”

其二，‘公’利而非私利。《论语》中孔子讲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荀子》中也有：“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中国人讲的是为天下人谋同利，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内圣外王”。这儿的‘王’不是作威作福的王，而是为天下百姓谋取利益，并且承担罪责的王。《论语》中有一句很令人感动的话：“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是商汤在伐夏桀前所讲的话。意思是如果我有罪过，做错事了，请上天不要指责老百姓。但是天下百姓的罪责，都由我来承担。这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才是真正的王道。这也正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十字架精神’（耶稣为承担世人的罪过而甘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体现。

其三，远利而非近利。中国人看重的不是急功近利，而是长远的利益。这里通过正反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点。《论语》中孔子先后四次提到管仲。其中，一次批评他不知礼（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三次赞扬他。一次称他是“惠人也”（给予人恩惠的人）。其余两次赞扬管仲是仁者（如其仁！如其仁！）。既然管仲不知礼（克己复礼为仁），又没有随他的主人公子纠殉道，反而跟随了公子纠的对手，即后来的齐桓公，为什么孔子还说管仲是仁者呢？这是因为管仲匡正了天下，使人民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至今还会处于披头散发，衣襟左开的野蛮落后时代（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另一个例子是记载在《吕氏春秋》中，子贡赎人的故事。鲁国有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沦落为奴隶的同胞，将其赎回，就可以得到补偿和奖励。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却不向国家领取奖励。孔子不仅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他说：“子贡，你错了！圣人做事，可移风易俗，授之于民，而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无所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由以上两个例子可知，孔子看重的是长远的利益，天下百姓的利益。注意，西方一些有远见的商人，也会牺牲一些小利和近利，为了取得长远利益。不同的是，他们所考虑的长远利益还是自己的私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

享乐主义，又称为伊壁鸠鲁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之一。享乐主义者认为享乐是人类最重要的追求。追求快乐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但是怎样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呢？现在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是肉体的快乐和情欲的满足。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节制和俭朴的生活，反对恣情纵欲、铺张浪费、挥霍享乐。‘俭’被列在儒家的五种贤德（温、良、恭、俭、让）和道家的三宝（慈、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注意，

俭的本义是指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对自己加以约束。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讲到“俭以养德”。言下之意就是纵情享乐会败德。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清心寡欲、知足长乐的生活。孟子曾讲到“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佛家讲究的是六根清净。六根是指人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根即功能的意思。为什么要六根清净呢？其实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解答：五色令人目盲（对应的是眼根），五音令人耳聋（耳根），五味令人口爽（舌根和鼻根），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身根和意根）。诸葛亮在《诫子书》所讲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也是相同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也反对极端的苦行。儒家和道家都提倡‘少私寡欲’，而不是无欲。佛家讲的是中道。佛陀当年就是因为放弃苦行，走中道才得以大彻大悟的。

当然中国人也很注重‘乐’。就《论语》来看，‘说’（通悦）和‘乐’出现过许多次。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同的是，孔子所说的‘乐’是不受外界物质环境影响的，由内而外的，是因闻道、学道和悟道而发自内心的大乐。

孟子也曾讲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意思是说君子有三种乐，但是称霸天下却不在其中。第一种乐是，父母健在，兄弟平安。第二，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第三，能够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之。可见这三种乐没有一个是为了满足自己肉体 and 情欲的乐。这三种乐分别源自于孝悌之心、道德和良心、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心。

此外，中国人的心量极大，常以天下人的心为己心，常以天下人的乐为己乐。例如《道德经》中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曾讲过：“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的那句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源于孟子的这句话。这里以《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的一段对话再加以说明。

孟子得知齐宣王爱听音乐，就问齐宣王：“一人独享音乐的乐趣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乐趣，哪个更快乐？”齐王答道：“当然是和大家一同分享更快乐。”孟子又问：“与少数人同乐和与大众同乐，哪个更快乐？”齐王答道：“当然是与大众同乐更快乐。”孟子说：“如果大王在此奏乐，而百姓却皱眉诉苦：‘大王如此喜欢音乐，为何让我们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呢？’如果大王在围猎，而百姓却皱眉诉苦：‘大王如此喜欢打猎，为何让我们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呢？’这不是因为别的，只因大王不能与百姓分享快乐。如果大王在此奏乐，百姓欣喜而相告：‘大王一定身体安康，要不怎能奏乐呢？’如果大王在围猎，百姓欣喜而相告：‘大王一定身体安康，要不怎能狩猎呢？’这不是因为别的，只因大王能与民同乐。今天大王若能与民同乐，则必能统领天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和‘自由’

自由主义在西方很流行。这里所指的是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它所注重的是个人在行为、言论、思想和道德上的自主权力。这体现在比如：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认知自由等。简而言之，只要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我们留意观察和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样的自由主义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极大。正如《圣经》中所讲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并不反对人们对性和饮食的欲望。《礼记》有云：“男女饮食，人之大欲存焉。”但是儒家强调的是要“发乎于情，而止乎礼”。中国是‘礼义之邦’，最讲究礼了。礼的意义很深广。从行为层面上讲，礼是对我们言谈举止的指导和约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矩’。儒家的礼和佛家的戒很相似。颜回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先概括地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然后孔子说，真正把‘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礼在儒家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孔子曾对他儿子讲过：“不学礼，无以立”。而且如果没有礼，好的品德（如恭敬、谨慎、勇敢、直率）也会变成缺点。孔子在《论语》中讲过：“恭而无礼则劳（烦恼不安），慎而无礼则蒞（畏缩、拘谨），勇而无礼则乱（违法作乱），直而无礼则绞（说话尖刻、伤人）”。由此可见，依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每个人的言谈举止都应该有礼有节，不是随意妄为的。

拿言语来说，现在大家都提倡言论自由。只要不违法，什么都可以说。这和中国人的传统是不同的。中国人对说话是很谨慎的（敏于事而慎于言）。要说就要说到点子上（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佛家的十善业（即十种根本的善行）中就有四条是和言语相关的：不妄语（说话诚实）、不两舌（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不恶口（不恶语伤人）、不绮语（不花言巧语，不讲轻浮无礼，戏弄人的话）。古人云：“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语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尤其在科技发达的当今，传播言语的途径越来越多，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因此，如何说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益处的话，在当今这个时代尤为重要！

再拿着装来说，美国人穿着向来是很随意，也很开放的，尤其是在非正式的场合。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服装的样式和穿戴都有许多规定和讲究。中国传统服饰的特点之一是含蓄内敛、端庄稳重、藏而不露。《周易》中有句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话：“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意思是没有把自己的财物收藏保管好，就等于叫人来偷。将自己打扮的过于妖艳性感，使别人生起淫欲

的念头，就等于引诱人来调戏自己。在西方社会，和性相关的犯罪率很高。这和“冶容诲淫”是很有关系的。

其实中国人也很向往自由。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就是中国人所推崇的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从心所欲”的前提是“不逾矩”。它的基础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道家也提倡自由。道家的自由是指不受自身物欲捆绑的自由，是清净无为的自由，是万物齐一，天人合一的自由。佛家称真正的大自由为涅槃。涅槃不是灭亡，而是真正的解脱和自由。

老祖宗的智慧

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知道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重要性。这里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我们的老祖宗是如何传承和发扬自家文化的。

其一，文言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要把传统文化和思想完好地保存下来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载体。而中国地域广阔，语言体系复杂且多变。所以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文言，使之与口语区分开，用来记载传统文化和思想。几千年以来，文言的变化不大，所以后人能较为容易地阅读古籍经典。此外，文言是最好的书面语言之一。文言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微言大义。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要旨。

其二，我们的祖先对典籍的保存、整理和归纳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孔子可以说是其中的王者。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有五千年而孔子生活在距今两千五百年前左右。孔子在当时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对传统文化和典籍的整理、归纳和承上启下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除此以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的对典籍和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归纳。第一次是在唐朝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命魏征、虞世南和褚遂良等人从一万四千多部，近九万卷古籍中，挑

选出六十五部。再浓缩成五十卷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其特点就是“博而要”。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元老习仲勋对《群书治要》十分重视。还曾亲自题词，并将《群书治要》列中央党校读物。第二次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晓岚等三百多位高官、学者编撰，近四千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有三千五百多种书，近八万卷，三万六千册，约八亿字。《四库全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乾隆还命人手抄了七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有意思的是，这两次汇集正好是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鼎盛的时期：“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是巧合吗？其实只要看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如果统治者重视传统文化，那个朝代就会比较太平，百姓生活也会相对安逸。比如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节俭戒奢、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的黄老治术，所以成就了“文景之治”。康熙皇帝在亲政主事后，力推“经筵日讲”。每天选内臣给皇帝和满朝文武进讲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在《康熙朝实录》中有记载：“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由此可知“康乾盛世”的出现也绝非偶然。

其三，我们的祖先对优秀的外来文明，也十分重视加以吸收、保存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两千年前，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一个最显著的证据。佛教起源于古印度。所以佛经都是以印度的文字写的。因此，当佛教传入中国后，需要有人来翻译佛经。其中鸠摩罗什是后秦时期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夺鸠摩罗什一个人，竟然发动过两次战争¹！后来鸠摩罗什被以国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史书中有“三千弟子共翻经”之说）的译场，请他主持译经事业。鸠摩罗什在中国一共翻译了三十五部经论，共二百九十四卷。其所译经典流传极为广泛，例如《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等。在唐朝时期，玄奘大师去印度求法。归来时玄奘大师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以玄奘大师为首的译经团队共翻译了七十四部，

一千三百三十八卷佛经。除了翻译佛经，我们的祖先还因地制宜，融汇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的理义，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文化。

不仅是我们的祖先知道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不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学者也都意识到这点。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在《展望 21 世纪》一书中就提到：“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注意他说这话是在 1972 年。他还讲到：“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博士，他的代表作是十二册的《历史研究》。在书中，他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分为二十一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这种观念是很明智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文明比国家对世界和历史的影响更大，更持久。而文明的主体就是传统文化。另外，高本汉博士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他曾经说过：“汉字不可改，文言不可废，经书必须读。”这话不仅仅是对中国，而是针对全世界来说的。

被误解的‘忠’和‘孝’

由于长期的不重视和不了解，使得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许多误解。使得不少人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把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当作糟粕来看待。这样的态度和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如果要否定一个事物，必须得先要真正了解它才行。不知道那些要打倒“孔家店”的人，有没有真正研究过四书五经，是不是真正了解儒家思想。

儒家的“三纲”是儒家思想中最为诟病的。“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少国人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忠’和‘孝’是‘愚忠’和‘愚孝’；是单方

面的、奴性的‘忠’和‘孝’；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实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论语·先进》中，季子然问孔子，他的学生子路和冉求是否能做大臣。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季子然又问：“那他们会服从他们的君王吗？”孔子回答：“弑父与君，亦不从也。”所以臣子对君王的服从是以符合道义为前提的。另外《论语·八佾》中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君臣关系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愚忠。孟子在《孟子·离娄篇下》中更是直接地讲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孝经》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集中阐述了以‘孝’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以下摘录的是《孝经·谏诤章》中的内容。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大致意思如下。曾子问：“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有关孝道的教诲已经听过了。再冒昧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说：“这是甚么话呢？这是甚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直言相谏的诤臣。所以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直言谏争的五位诤臣，所以虽无道，不失其国；卿大夫也有三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虽无道，不失其家。普通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身的美名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

儿子，就能使父亲不陷于不义。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如系君王所为，则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怎能称得上是孝顺呢？”

荀子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荀子·子道》中，荀子对“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做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他提到：“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衰；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衰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诚实，谨慎）、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

由上面的举证和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所说的‘忠’和‘孝’都是以符合道义为前提的，而不是奴性的、绝对的服从。一味地注重形式，而不明其义的‘愚忠’和‘愚孝’并不是儒家所倡导的。

当然如果父母或上级长官有过错的时候，做子女或下级的在劝导时应该注意措词、方式、时间和场合。正如《弟子规》（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中所讲的：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挹无怨。」

劝导时态度要诚恳，声音要柔和，且和颜悦色。如果父母不听规劝，要耐心等待，一有适当机会，如父母情绪好转时，再继续劝导；如果父母还是不接受，甚至生气，此时做子女的虽难过得痛哭流涕，也要恳求父母改过。纵然遭到父母的责打，也不抱怨，以免陷父母于不义，使父母一错再错，铸成大错。

中国传统思想中很注重“经权之道”，也就是“守经达权”。“经”是常的意思，是不变的原則。“权”是变通，是通达变化的手段和方式。儒家所倡导的‘忠’和‘孝’的‘经’是道义。

所以，守住道义是‘忠’和‘孝’的原则和底线。另一方面，权变的合理应用在实际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权变之道在‘忠’和‘孝’中的应用。

春秋时期，齐景公有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暴病而死。齐景公得知后，大怒，一定要将养马人肢解处死。晏子就问齐景公：“大王，肢解人也须有个方法步骤。但不知古圣尧舜肢解人，是从哪里下手的呢？”怒火中烧的齐景公听了这话后如冷水泼头。因为他想到尧舜是古代圣王，爱民如子，哪里会肢解人呢？而如今自己所要做的，与圣贤背道而驰，却与夏桀商纣为伍。齐景公内心有所惭愧，便顺口说道：“从寡人开始吧。”侍卫们一听，就马上退下了。虽然不肢解养马人了，可齐景公余怒未消，下令说：“免去肢解，将他交付牢狱，处以死刑。”晏子听了，并没当面阻止，只是向景公作礼而问道：“君王，此人罪大莫及，只可惜他还不知为何要被处死，恐其死不瞑目。不如让微臣替陛下将他所犯罪状一一说明，也让他有所知道，再交狱执行，这样他也死得甘心。大王，您觉得如何？”齐景公觉得晏子的话不错，便答应了。于是晏子当着众人之面，大声数说起养马人的“罪过”：“你知不知道，你犯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君王让你养马，结果不小心，马暴毙死了。这就等于你杀了马，所以你理当被处死；第二条，死的马是大王最爱的马，所以你理当被处死；第三条，君王因为一匹马就杀人，让全国百姓知道后，必定会因此埋怨君王爱马胜于爱人；诸侯知道后，必定会轻视我国。但究其原因，是因为你把君王的马养死了，最后竟让百姓生怨，国力削弱，更应被处死。现在，马上交付狱吏，快快执行死刑吧！”齐景公听后，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晏子所讲的每一条都不足以判养马人死刑，而且从中也看到自身的过错。不由喟然长叹，对晏子说道：“先生马上开释他吧！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伤了我的仁德啊！”作为忠臣的晏子，为了救养马人而劝谏齐景公时，巧妙地运用了欲擒故纵的权变之道。下面这则记载在《孔子家语》里的故事是其在孝道上的应用。

曾参和他的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曾参是著名的孝子。一次，曾子在瓜田除草时，不小心砍断了瓜根。曾点大怒，用棍子把曾子打昏，倒在瓜田，很久才苏醒过来。曾子醒后马上向父亲认错，随后操琴唱歌，以示身体安然无恙，免得父亲担心。孔子知道后却告诉曾子：“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舜的故事吗？舜作儿子时，父亲用小棒打他，他就站着不动；父亲用大棒打他，他就逃走。父亲要找他干活时，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想杀他时，却找不到他。你父亲在失去理智，暴怒的时候，拿大棒打你，你却不逃走。如果你被打死、打伤或打残废了，他以后一定会感到十分懊悔，也会招徕别人的嘲笑和非议，陷父亲于不义。你这样做，怎么能算作是孝顺呢？”曾参听了以后惭愧地说：“我犯的过错太大了！”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问题

这里列举了几个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并给出我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其中有不正确或偏颇的地方请大家原谅和斧正。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已经过时了？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即它的‘体’，是不会过时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扎根于人的性德，是人的本性（即良心）的流露。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儒家来讲吧。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根本是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的本义是对父母的敬爱和护养。我想大家都会认同“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存在于每个人的良心中的。孝顺父母在西方文明中也被普遍认为是基本道德。例如《旧约》中的“摩西十诫”就有“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而且是唯一应许遵守此诫命的人可得福分的诫命。儒家把对父母的孝心由内而外、由己及人地扩展到‘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成为‘五常’（仁、义、礼、智、信）。虽然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但是人心没有变，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和伦理道德没有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和精神是不

会过时的。试问一下，有哪个时代或地方的人不愿意接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呢？有哪个时代或地方的人不愿意接受“仁、爱、和、平、温、良、恭、俭、让”呢？这些品德都是每个人所向往的，也都存在于每个人的良心中。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即承载中国传统思想的经典著作，也是不会过时的。因为它是对‘体’的阐述。经典中的‘经’是不变和常行的意思。所以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们是不会过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用’是‘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它包括传统文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传统戏曲、民族工艺、中医武术、对联灯谜、烹饪服饰、建筑装潢、风俗习惯等。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活习惯都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用’是应该与时俱进的。注意，这并不是说要完全丢弃原来的，而是在不违背传统思想和精神的前提下，适当地加以改进，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满足当代人们的需求。《论语·子罕》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孔子是如何做到与时俱进且不违背原则的：“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麻冕是古时一种用麻布做的礼帽。‘纯’是用黑色的绸布做的礼帽。由于麻冕的制作步骤繁琐、手工精细，所以成本较高。孔子说：“戴麻冕是合乎于周礼的规定。现在大家都用黑绸布制作，这样比过去节省了，我赞成大家的作法。臣见国君首先要在堂下跪拜，这也是合乎于周礼的规定。而现在大家都到堂上跪拜，这是骄纵的表现。虽然与大家的作法不同，我还是主张先在堂下拜。”麻冕改为纯冕，孔子因其俭而赞同。拜下改为拜上，孔子因其助长臣子的骄泰作风而不随众。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否有糟粕？有人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当今高僧大德净空老法师。老法师的回答很妙。老法师说：“有！看不懂的就叫糟粕，因为不识货，像黄金摆在面前不认识，那不就成了糟粕吗？而识货的人知道它是宝！”的确，当我们认为一个事物是糟粕时，有没有先反思一下，是否真正了解它呢？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有关‘愚忠’和‘愚孝’的问题，就是很好

的说明。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不少人认为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观念是消极厌世的，抑或是阴谋诈术、虚伪不为。其实道家所说的“无为”是要我们“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并不是要我们不去做事，而是要我们顺从自然规律去做事，即顺势而为。同时“无为”也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意思。就是道家所提倡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顺便提一下，“无为”在英文里常被翻译成 inaction。这是误解了“无为”的真正含义。曾经看到有人把“无为”翻成 nondoership。我觉得 nondoership 更能表达“无为”的意思。

除了以上因误解而认为是糟粕的情况以外，还有一类所谓的“糟粕”，是因为我们没有追本溯源，没有找到真正的源头，而只是道听途说，被一些不懂之人所利用和欺骗而产生的。比如相面和算命是被许多国人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迷信的代表。这样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要想真正了解相面和算命，首先要除去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其次要追本溯源，找到正确的经典来研究。真正的相面之术，不仅是看人的面孔，还包括人的言谈举止、动机目的来识别人的内心、精神和气运。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大致意思是：看人的动机和目的；看人行动的经过和出处（依据）；看平常作人是安于什么。以这三点来观察人，人还有什么可藏匿的呢？南怀瑾老师曾推荐两本有关相面的经典：黄石公的《素书》和曾国藩的《冰鉴》。这两本书都是以儒、释、道的传统思想为依据，来阐述相人、识人、用人之道的经典。相面的义理是很精深广博的，其中包括佛家的“相由心生”，道家的“精、气、神”之说，和儒家的“道、德、仁、义、礼”等。同样，关于算命，我们也要先放下成见，找到真正的源头和经典，才会对它有真正的了解。其实算命只是命理之道的一个分支。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理之道，就不能不去研究儒家的《易经》和佛家经典，尤其是因果报应的理论。袁了凡先生所写的《了凡四训》也是一本很好的有关命理之道的参

考书。书中袁了凡先生通过自身的经历和援引许多其他例子，详细讲述了如何通过断恶修善来改造自身命运。是一本讲述命理之道的实际应用及案例的好书。

还有一类我们所认为的糟粕，其实并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一些地方的陈规陋习而已。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用’里面也包括风俗习惯。但是，不是所有的风俗习惯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标准在于是否以中国传统思想（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体’和‘相’）为依据。这里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闹洞房”的习俗始于先秦汉代时期。孔子在《礼记·曾子问》讲过：“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归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这反映了先秦婚礼的淳朴习尚、子女思念父母养育之恩的心情、以及对婚姻的慎重态度。完全没有现在所谓的“闹洞房”那样喧嚣纷闹，大操大办，以挖苦和取笑新郎和新娘为乐趣的场面。所以我认为，现在所谓的“闹洞房”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第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让人不思进取？首先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以农业为主的，所以勤劳、朴实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特性之一。《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很形象地反映出中国人的勤劳和朴实的特点。其次，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也包括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十分强调不断发展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所以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佛家也把“精进”作为六度（佛家修行的六项主要内容）之一。

第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和宗教信仰有抵触？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是教导人如何做一个有良知的好人，与人为善的人，安分守己的人，有高尚道德、品行和情操的人。一个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无论是学佛，学耶稣，学安拉也好，都是以作一个好人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要想成佛或成圣是不可能的，是空中楼阁。其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一个人性化的、独一无二的造物主或上帝。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中，那个至

高无上的“第一因”被称为‘道’。‘道’是形而上的，非人性化的。在佛教里，佛陀和所有的佛、菩萨们一样，都不被认为是神，而是以老师的身份来教导信徒的。所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在教义上应该不会有根本的抵触。不仅如此，在言谈举止和为人处事的教导上，还会有所帮助。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佛教是从汉代以后才传到中国的。在传入以前，土生土长的儒、道思想在中国已经很有影响力了。我们知道，佛教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小乘佛法是大乘佛法的基础。佛陀在《佛藏经》里面曾讲过：“学佛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可是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大乘佛法变得非常兴盛，共有八个宗派（慈恩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律宗）。而小乘佛法却只有两个宗派（俱舍宗和成实宗），并且都在唐朝初期开始就已经衰微，失去影响力了。为什么中国人可以越过小乘佛法而直接进入大乘佛法呢？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儒道文化替代了小乘佛法，为中国的学佛人打好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得中国人可以直接进入大乘佛法。反观现在，佛教为什么在中国已经日渐衰微呢？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已经渐渐丢失了。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或小乘佛法的根基，要想直接修大乘佛法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第五，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很紧急的大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其一，从个人层面来讲，作为炎黄子孙，都应该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具体来讲，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努力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应该从何处入手呢？我认为应该从它的‘相’入手，即从阅读中国传统经典书籍开始，为最佳和最直接的途径。然而，现代人的文言文阅读水平远不如古人。所以，直接阅读古典著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想掌握文言，并没有什么捷径。只有靠不断地阅读和查询字典，才会越来越熟悉文言。另外，参考近代和现代学者和大德们对经典的注释和解说，对我们理解经典也很有

帮助。有一点是值得有志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注意的。那就是：理解不等于掌握。《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应该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关键是‘时习之’。我们不能“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时习之”就是要我们学以致用，不断地在生活中操练、反省、进步、再操练、再反省、再进步。要真正落实《大学》里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不仅使自己的境界能得到不断提高，也会因为自身言语行为的改善和变化，来感染周遭的人。南怀瑾老师曾讲过一句话：“教育不是管理，而是影响和感化。”这句话对崇尚言论自由的当今社会来讲，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现在谁都可以发表言论，而且都很愿意发表言论，这样一来言教的影响力就大大降低了。所以，默默无闻地自己去行、去做，通过以身作则，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样，默默地感化周遭的人，也许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其二，从社会层面来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和宣传。教育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宣传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催化剂。重视教育是中国人的良好传统之一。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教育方向出了错。家长和学生们都重成绩、轻德育；重知识、轻能力；重表现、轻内在；重名次、轻道义；重争夺、轻谦让；重自我、轻集体。只要我们能将教育方向纠正过来，注重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大有希望的。关于宣传，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以“隐恶扬善”作为宣传的指导方针。隐恶扬善出自于《礼记·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为什么要“隐恶扬善”呢？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人都有从众心理。我们都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试想一下，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所见所闻都是好人好事，另一个所见所闻都是坏人坏事。那么，哪个人更容易变好，哪个更可能变坏呢？当然是前者更可能成为好人，而后者更容易变坏。现在的新闻媒体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博取大众的眼球，大肆报道许多凶杀、暴力、淫秽、阴暗、丑陋、血腥、离奇、荒诞的事件。这样的宣传对社会的风气有怎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很少谈论怪异、暴力、

变乱、鬼神等事（子不语怪力乱神）。其次，“隐恶扬善”还可以避免许多社会矛盾，增进团结和稳定。比如前几天在达拉斯发生的袭警事件，有五位警察被黑人狙击手枪杀。公众都把这件事归结为警察和黑人之间的矛盾，或种族歧视，或禁枪的问题上。大家有没有想过，宣传媒体在这场悲剧中所起到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类似发生在巴吞鲁日的警察枪杀黑人事件（被认为是达拉斯袭警事件的直接导火索），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一贯地在第一时间大肆报道，滚动播放，无形中激发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其实，对于警察枪杀黑人事件，不管谁是谁非，都可以通过低调的方式来处理。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的报道。再次，“隐恶”对发生不良事件的当事人来说，也是更为宽容、人道的处理方法。给予了当事人改过自新，让其免受舆论压力的机会。要注意的是，“隐恶”不是包庇纵容罪恶，而是不要大肆宣扬‘恶’。比如上级发现一位年轻有为的下级犯了错。他会把下级叫到办公室，单独和他谈话。指出他的过错，并狠狠训责他一番，并给于相应的惩罚。但因为看到下级有悔改心，所以在公开场合这位上级会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这样既教育和惩罚了下级，也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和保护了他。这就是“隐恶”。关于“扬善”，不仅要宣扬当代的好人好事和古圣先贤的事迹，而且还可以通过电台、电视和网络来播放有关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专题讲座和相关影视作品等。

1：东晋太元六年（382年），苻坚遣大将军吕光攻伐焉耆，继灭龟兹，取鸠摩罗什至河西走廊凉州鸠摩罗什寺。后秦弘始三年（401年）皇帝姚兴遣硕德率军西伐后凉，又迎鸠摩罗什至长安。